

2/13



丰都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九、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二、选刊的稿件多数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少数系搜集综合整理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一定有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不定期发行，以供研究历史和有关部门参考。

三、本选辑所选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予选入。

四、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五、本选辑对来稿按不同情况，得作摘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甘为革命献青春	
——熊达士烈士生平事略	
.....	李德茂、姚玉枢 (1)
回顾历程忆兄长 肖琪 (5)
我的经历 何洛 (9)
惠及平民 道在树人	
——忆惠平小学校长曾季鲁先生	
.....	陈朝栋 (13)
为人类谋幸福而努力作人	
——缅怀丰都公益事业活动家王净友先生	
.....	陈朝栋 (19)
我的父亲李桂芳 李菊荣 (22)
难忘的师表	
——怀念王净友先生和曾季鲁同志	
.....	王学胜 (25)
我所知道的郑许无 郑性忠 (35)
陈兰亭其人 问渠、玉枢、嘉万 (42)
丰都进士、举人简介 何嘉万整理 (47)
日寇轰炸丰都所见 周邦达 (59)
丰都县防护团之组成及其总干事刘耕的殉职 戴烈武 (63)

回忆创建时期的适存女中	冉成昆	(66)
抗战初期的适存女中	熊若兰、张淑贞、孙德桂	(68)
王志五先生二、三事	邹友蒸	(77)
民国时期的丰都县立中学校	戴蕴渠	(79)
我所知道的琢成中学	汤 池	(81)
关于平都中学	董心评	(87)
我的父亲陶荣廷与用宾中学	陶廷慧	(91)
陶仲辞官弃禄兴学	陶一揆	(93)
我所知道的丰都简师	何嘉万	(95)
简师一年半	曾兴祥	(104)
我回忆中的两所学校	王学胜	(106)
建国前丰都的一艘私营商轮——“江泳”		
	甘维勤口述 田耕夫整理	(111)
平都山的演变和“鬼国”“冥府”的传说		
	石大城(遗稿)	(117)

质疑、补充、订正

重庆源裕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和裕丰源商业银行 的始末	李纯卿	(126)
-----------------------------	-----	-------

甘为革命献青春

——熊达士烈士生平事略

李德茂 姚玉枢

熊达士同志，丰都县董家乡红垣村人，1909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家共五人：其父熊发国是个颇有医术的中医，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深为乡里敬重；其母姓王，其妻杜氏均在建国前病逝；一女名云秋，幼靠祖母抚养，年方十三，即受封建婚姻束缚，被送往忠县新立乡黄家作童养媳，今健在。

少 年 时 代

达士家贫无力上学，幼时随母干些杂活度日。年满十岁，父母省吃节用攒点学费，始有幸跨入本乡罗家庙私塾读书。约在十七岁时，考上董家场高小；十九岁时考入丰都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县中”）。他学习刻苦，思想进步，成绩优良。

1928年秋，达士经当时任丰都团委书记的陈某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受到了革命熏陶。他革命热情炽烈，常常废寝忘食地研读革命书籍，探讨社会问题，逐步树立了

无神论的观点和反封建、闹革命的思想。有一次，其父迷信阴阳先生的话，说他家“北方上当年不空，忌讳去那方动土”。达士哪信那一套，偏于当年正月初一，动手撬开了横屋北边的一块石板，用事实说服了家人。当地杜家寺塑了个泥菩萨——“送子娘娘”，周围有些迷信者奉为神灵，每年正二月总爱去给“送子娘娘”烧香或搭红。某年二月，达士与进步同学游一民等赶到该寺，当着敬神的一群“信士”，随手扯下“娘娘”头上的一叠红帕，并将燃着的香烛拔了，结合向大家作了一番破迷信、讲科学的现场宣传。时至今日，董家场一带尚流传着达士破禁土、戏菩萨的故事。

革 命 生 涯

达士在“县中”念书期间，在丰都地下县委的直接培养和一些革命者的影响下，政治觉悟大大提高。1929年下半年他接任丰都团县委书记后，负责领导该校学生会的活动。达士善于团结同志，工作卓有成效，同年，经批准转为中共党员。

达士入党后，无论在县城念书，或是回乡度假，总是肩负起党交给的任务，尽心竭力地去完成。有个暑假期，他豪情满怀地返回家乡，配合当地革命人士，在董家场口贴出“打倒军阀！”、“打倒土木偶像”等革命标语。当地掌红吃黑的袍哥大爷杜宏图一伙，出面横加干涉。达士挺身向前，舌战地头蛇，宣扬革命真理，备受群众称道。

在“县中”校后期，达士以团委书记身份参加了地下县委会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常常带领进步同学与潜伏该

校的特务、狂徒争斗，维护师生们的正当权益。1929年十月十日，县城召开民众大会庆祝“双十节”。时任县长的吴伯让在会上吹嘘：“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讲究自由平等，不要钱，不拉丁……”达士随即以学生代表身份登台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说：“政府不要钱，不要毛钱；不拉丁，不拉老人、小孩，专拉青壮年当壮丁！……”使在场的军阀陈兰亭和县府官员大为恼火。1930年春，驻县边防军司令陈兰亭兼马路局“总办”伙同“会办”余仑光（即余绍庚）下令大肆征调城乡民工，拆毁贫民住房，扩建县城街道和修筑城郊公路（甘蔗坝至鹤公堡段）。熊达士、廖晓东等同志，利用县府指派学生修路拉碌之机，沿途向广大民工宣传革命，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余绍庚与官绅吴锦堂等狼狈为奸，一面组织流氓打手从中捣乱，一面向陈兰亭告密，妄图扑灭革命之火。

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推动我县的革命活动，1930年三月，丰都地下县委决定组织一次“五一”游行示威，并选出钟世民、廖晓东、朱芳淮、杨烈光和熊达士等同志负责筹备纪念活动。陈兰亭、吴锦堂等探知此事，更加惊恐。赶在四月廿九日上午，由吴锦堂和陈部参谋长李斌出面，率手枪大队长廖青云等一群警丁，先将“县中”校包围，然后集合正在上课的全体师生，点名抓走了钟世民、熊达士两同志。

英 勇 就 义

钟、熊二同志被捕后，敌人开庭严刑审讯。他们大义凛

然，痛斥凶顽，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反动头目陈兰亭、吴锦堂一筹莫展，慌忙于1930年五月三日上午，将钟世民、熊达士两同志，杀害于丰都城商业场口，制造了震惊全川的“钟熊事件”。

钟熊就义时，面不改色，高昂着头，不断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慑制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民众继续革命的斗志。

“丹心照汗青”

钟、熊同志遇难的消息传开，全县人民感伤不已。“县中”校的革命师生，立即用白绸裹了达士的尸体入殓，护送回老家安葬。沿途民众锣鼓火炮接送，纷纷挥泪哀悼。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更加怀念先烈们的丰功。一九六三年董家公社党委将达士的英雄事迹编写书剧，在干群中讲演，对全社人民深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64年春，烈士所在大队的青年新修了达士墓，树起了纪念碑，称颂“烈士的革命气魄，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每年“五四”节，董家乡的青年团员、学校师生，总要将精心编织的花圈，一批批奉献到烈士墓前。1983年十月七日，丰都县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全县人民：“学习熊达士等烈士的英雄业绩和为国为民，无私无畏，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和崇高品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回顾历程忆兄长

肖琪

我从小父母相继去世，有两个哥哥。我是二哥唐洁身带大成人的。三哥唐涂丹在我七岁时就去世了。

一九二七年，我七岁时，有一天，听二哥说：“好久没有接到涂丹的信了。”这以后，接连几天他老是泪流满面，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后来才听他说：涂丹被反动派杀害于牢房中，这一噩耗是三哥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他的好友牛原亮来信告诉二哥的。二哥和他的朋友们为三哥开了追悼会，以示对死者的悼念和对反动派的声讨。接着唐洁身从重庆烧了两块一尺大小的半身瓷像，一块是我母亲的，一块是三哥的。一起放在我家堂屋放祖宗牌位的木架子上。三哥在家时，我只有四、五岁，对他毫无印象，他的面貌是从这块瓷像印入我的脑海的。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那具有四川人特征的瘦个子，微长的瓜子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严肃而庄重的相貌，俨然是一位朝气蓬勃、性格刚毅的英俊少年。

他是在一九二六年，正当我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和全国有志于革命的热血青年一样，奔向革命的熔炉，考上了广东黄埔军校第六期。当然也

是得到二哥的直接影响和支持的。后来，正当北伐战争的革命烽火熊熊燃烧的时候，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于一九二七年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也开始了清党。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杀。三哥就是在这次大屠杀中被害死于狱中的。当时，他只有二十来岁，就献出了青春年华。

我还听二哥说过，三哥在世时，经常来信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妹妹，要好好爱护她、培养她，一定要送她上学读书……。这些话语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和两位哥哥不是一母所生，但我们兄妹手足之情是很深的。其实他们不仅是念兄妹之情，也还是在培养一个革命的青年哩！

全国解放时，1949年我随西南解放大军入城到成都市工作，1950年有机会见到了牛原亮同志，从他那里得知唐涂丹牺牲时还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名热血沸腾的共青团员。

牛原亮同志以后回四川，曾考上国民党的县长，以此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不知他何时入党）。老百姓都说他是一个好县长。不幸他死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如果他还健在的话，对唐涂丹的革命事迹会回忆得更多些。

对二哥唐洁身，我是今年回家探亲时，看到他逝世后追悼会上的悼词和他的挚友陶一揆的讲话，才知道他曾于1927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以后虽然脱党，但仍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我在家时认为他是一个守正不阿、爱打抱不平、说公道话、勤劳正直的人；思想比较进步。他经营的书店《道生益》，卖一些新文化书籍。有时听说政府要来搜查，我就看到他烧毁一些书。反动政府曾一次查封过他的书店，抄了家，说是抓共产党，抓走了二嫂和店员。三哥因

事头一天到了高家镇，才免遭逮捕。他在丰都县城内办过夜校，亲自任教员，以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和传播进步思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像幼苗一样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

丰都县城不是一个平静的小城，而是有着革命影响的一个长江之滨的小城市。我还记得，在我念小学时，反动派枪毙了丰都县立中学的教员钟世民和学生熊达士，说他们是共产党。游街时，我在家门口看到他们两手被反绑在背后，背上插了一个约二尺长、五寸宽的纸标子，上面写的什么记不清了，大概写的是什么“罪犯”吧！一边一个刽子手押着，还有一列部队跟着。钟世民圆圆的脸，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边走边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帝国主义……”。他那双眼睛冒出仇恨的怒火，他那英勇就义的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象。那时，我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因为贪官污吏、帝国主义当然应该打倒哪！为什么要杀他！当时，我就读的丰都县立女子小学校，也曾遭到政府搜查，抓过共产党。

我还常常见到在街道两旁的墙上，画的和贴的宣传画，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是洪水猛兽。可是在我心目中的唐涂丹、钟世民、熊达士他们都是好人哪！都是些文弱书生，不象洪水猛兽。所以在我童年时代，对共产党就不陌生，而且有了好感。

以后我进了丰都县私立适存女子中学。校长王志五的思想比较开明，聘请了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员。教我们史、地、语文的教员石大城，三民主义教员曾季鲁，都经常给我们灌

输革命思想，指导我们订阅进步的书刊，如七君子之一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我尊敬的已故的老师们，虽然都享受到全国解放的喜庆，但毕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未能见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祖国兴旺发达的景象。我离开学校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至今48年了，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教诲，我永远怀念着他们。

水有源头，树有根。回首自己走过的历程，我今日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是与自己在家时是处在一个比较进步的家庭环境，并得到社会上进步思想以及学校进步老师的教育和熏陶分不开的。由此，我才会勇敢地奔赴延安，走上革命的道路，直接受到党的培育。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中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悠悠岁月流逝，也抹不掉我对手足、师长们的深情与怀念！他们为之奋斗的民族解放、祖国繁荣昌盛的目标已经实现，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从未有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倘真有所谓“在天之灵”，他们也会为之欣慰。死者已矣，生者当更加奋勉。我虽年逾花甲，仍当为祖国四化建设尽力贡献余热，以慰英灵。

注：肖琪，原名唐竞华，曾用名郝霞秋，四川丰都县人。生于一九二〇年，一九三六年前在丰都县立女子小学，私立适存中学读书，一九三八年春起在重庆东方中学读书。一九三八年七月赴延安，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一九三八年十月入党。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起历任山西省离石县妇救会组织部长、秘书、县妇委，临县中心区妇救会组织部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随军到成都市任市妇联组织部长，中共川西区妇委委员，川西区妇联秘书长。一九五二年春调中央地质部任机关党总支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教育司副司长。一九八二年已离休。

我　　的　　经　　历

何　　洛

编者按：我们曾向何洛同志征稿，希望知道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以教育后进。承他不吝珠玑，寄来此文，特于本辑刊出。编辑时对原标题作了更换。对原稿本文有删节，并此说明。

—

我原名何明新，曾用名何鸣心，四川丰都人。生于1911年旧历七月。父亲名何绩廷，是贩药材、山羊和米粮等的行商。本钱不到一千，生意时好时坏。母亲曾氏，粗识文字，是家庭妇女。大哥何明德，约旧制中学程度，帮助父亲经营买卖。大姐嫁本县孙家，二姐嫁涪陵薛家。十六岁上，我毕业于县立旧制高小，1925年秋，家庭光景稍好，入南京美国人办的教会所属金陵大学附中读书。“五卅惨案”发生，在群众大会上，听了萧楚女富于煽动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演讲后，激于爱国热情，当即参加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发传单，去到下关英领事馆前示威，并在萧办的“人权日报”上批写热烈激昂的辞句并抄下寄回母校。愤慨之下，我越级转学国人办的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一年级。这时，我受“创造社”文学刊物的影响，对郭沫若的新诗很感兴趣。

趣，也喜读鲁迅的“阿Q正传”和茅盾（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并曾先后给县里好友杨奇勋、唐涂丹过沪去广东黄埔军校时在川菜馆饯行；又给过沪去苏联的本县人传朝璋送二十元路费（前者已在广州暴动中牺牲，后者不知消息）。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四一二”大屠杀，耳闻目见到不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的乃至进步的青年倒在血泊中，使人极为痛心和愤慨！家庭不放心，让我回家避避风险。返家后，又逢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著名革命家漆树芬、杨闇公等也遭捕杀。逃回县来的几位共产党员，知我算是在县里学界中为人注意的一个，并在留学北京同乡办的留京学会月刊上发表过文章，因此秦尚恒等同志便硬推举我为俱乐部主任，主编略带灰色的石印刊物“快乐之神”，每周出一单张。我曾在发刊辞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我很愿乌托邦实现，很愿得到一个真正的乐园，好保持我儿时的天真，好寻求我心灵的安慰。现在处世的虚伪的人生啊！可诅咒的人生啊！我再也不想与你共处在这个污浊的社会里面了。吾心归来呀！从人间归来！”（这后面两句乃引语）。刊物只出了两期，即因环境和经费的关系停办；俱乐部很快也偃旗息鼓。我还先后与秦尚恒等筹备过为小学毕业生考中学的暑期补习学校，由我负责义务教中文和英文，但因数学教师和办事人员一时难找乃停。其次就是和由日本返县的士官生甘海澜弟兄和其他几个人在夫子庙前“扯谎坝”搭台演出过新剧，名“妇女会”，全是男扮女装，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破除封建迷信。因为是新鲜事儿，观者倒是不少。事后，有位姓廖的老举人竟写诗讥讽我们是“纷纷学子做优伶”。不久，我与甘等又谋划打入乡镇团练办事处

工作，以便掌握武装，待机起义，不料甘海澜的老弟甘海平虽已上任，不到一月，即被县团练局长吴锦堂革职。一九二八年春，我随小同乡隆××东渡日本，补习日文后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专科肄业。按规定，每年可领县教育局规定的一百数十元的“贷费”。入学的中学毕业证书，是蒙浦东中学照顾，特别发给我的。在东京，经人介绍，我曾加入留日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研究会，学习和阅读苏联的马列主义政治、文艺理论书籍和日本左翼杂志的文章如“战旗”、“文艺战线”等。同组的人有漆树芬烈士的侄子漆宗棠弟兄四位和文艺工作者许幸之、司徒慧敏、沈西苓、冯宪章等。其间，还曾与日本左翼文化艺术界著名的人物秋田雨雀、藤森成吉、村山知义开过座谈会之类。济南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年，我们文艺研究会的一些人，为纪念这个惨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和镇压共产党的暴行，又参加过日、中共产党共同领导下的“银座”街头示威，散传单，在日警追捕中，我幸得逃脱。一九三〇年，我翻译了一本日本革命工人作家德永直写的小说“没有太阳的街”（十万字），由我国著名的革命作家蒋光慈（赤）介绍，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很快即被国民党检查书刊的人员勒令毁板。为此，我曾被日本便衣人员来寓搜查出由王炳南处拿来的庆祝江西“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小报之类的印刷品，当即被押到“巢鸭拘留所”拘禁，隔天审问一次，除拳打脚踢外，还用铅笔夹我手指，我总以：“这些刊物乃清晨不知谁从大门缝丢进来的”作答。根据日本法律，无确实人证物证而因某种嫌疑被捕者，经过拘留一月即可释放。但让我回到住所以后，仍不时被便衣侦探来“拜访”，查问我的近况，甚至警告我说，还是

早日回国的好。否则是很危险的……(大意)。“九一八”事变后，我和一些留日学生就到我国驻日使馆要求公使蒋作宾下旗归国，带领全体学、工人员离日，转陈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结果只允派代表团二十一人回国向政府请愿，我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我党先烈李大钊之子李葆华等。

二

到上海后，我们即以留日学生会分会的名义招待记者，进行活动。除了派代表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外，还出刊物《暴露》以揭穿日帝国主义必欲亡我的阴谋及其实行的步骤等等。同时，我还被派去大学讲演过。并集体参加党所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进行各种宣传组织工作。我个人还参加社联、左联，在“太白”月刊上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翻译稿等。一九三二年春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无候补期。从此，我正式专搞党的地下工作。不久便被调到法南区委任宣传部干事，跑秘密印刷所印党的文件，传单……。是年冬，我因参加纪念“广州暴动”的街头飞行集会，被叛徒当场指使侦探抓捕。一月后解南京宪兵司令部判无期徒刑，押送“中央军人监狱”坐牢。在狱中，又因宣传革命道理被人告发，参加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生活以及“七七”事变后和一些同志带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斗争等，曾几次挨打、带镣、永远不让作工，限制对外通信、接见。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国共合作抗日开始，经周恩来同志与蒋介石政权谈判释放政治犯，乃由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派副

官将我们接出监狱，审查后，我和少数同志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新形势下的新政策等。数月卒业，中组部就调我去马列学院编译部任日文组组长。主任是院长洛甫（张闻天）兼。马列学院与中央党校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举行晚会，演出过一个独幕剧“接皇军”和一个活报剧“阶级塔”，是我执笔写的。随后就调我去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不久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边区，我任此校文学系主任，以后又历任华北大学、人民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语文系等的负责工作，也任过校党委和文史各系的学位评定主席和校评委副主席。现任人民大学语文系名誉主任、教授。还在社会上负责一些工作：全国马列经典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兼学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联常务理事；北京社会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艺理论研究会顾问；北京文艺学会会长；北京人文函授大学名誉教授；北京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会办的民族大学校长；陕西延安文艺学会刊物顾问；《实践与美学》一书主编。

惠及平民道在树人

——忆惠平小学校长曾季鲁先生

陈朝栋

丰都县贫民教养工厂和孤儿所，于1935年合并成立救济院，院长王净友在院内开办职业班，聘请曾季鲁先生负责。